

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与国有企业 ESG 表现

李世辉,刘彦彩,李孟哲

(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作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的重要举措,组建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加强国家监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文以微观企业 ESG 高质量发展为立足点,利用 2014—2023 年上市企业数据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 ESG 表现,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机制研究发现,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是通过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和媒体关注度、调整企业高管招聘方向来改善国企 ESG 表现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党组织嵌入水平更高、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频次更高、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更完善以及直接受中央管理的企业中,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企 ESG 的提升效果更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认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通过强化国企 ESG 表现进而提高企业价值。

[关键词]党委审计委员会;ESG;国家审计;媒体关注度;审计管理体制;审计质量;审计监督体系

[中图分类号]F239.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6)01-0047-12

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各领域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国家审计需要与时俱进,主动改革创新以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建立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并组织实施在审计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方针政策,审议审计监督重大政策和改革方案,审议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审议决策审计监督其他重大事项等”。中央审计委员会的组建有助于推动形成国家审计深度嵌入党治国理政的总体格局^[1]。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保证国家审计“把握好、领会到、落实准”党中央部署,增强了国家审计的前瞻性、敏锐性和带头作用^[1-2],有助于推动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因此,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帮助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在企业层面进一步部署和落地,提高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政治功能。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除了经济增长,国家更要重视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社会文明的提升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培养。因此,全面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完整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企业 ESG 理念对企业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提出综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深度契合^[3]。但是,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投资存在一定的外部性^[4],需要外部市场和政府协同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推动作用。例如,媒体报道^[5]、投资者关注^[6]等外部环境因素可以强化企业外部监督,增强高管绿色认知,从而促进企业改善 ESG 表现;绿色税制改革^[7]、柔性税收征管^[8]等宏观政策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环保投入和绿色创新等途径正向影响企业 ESG 表现。那么,对于与政府存在天然联系的国有企业,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否发挥督促重大政策落实的作用,提高国企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及新发展理念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从而改善国有企业 ESG 表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收稿日期]2025-06-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27215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502248);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24JJ6540)

[作者简介]李世辉(1967—),男,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环境会计、公司财务与审计治理研究;刘彦彩(2000—),女,山东日照人,中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财务会计与审计研究;李孟哲(1993—),男,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从事资本市场会计与审计研究,通信作者,E-mail:leemengzhe@outlook.com。

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从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确立了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1],为宏观政策在国有企业中落地执行提供了根本性保障。首先,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解决现有审计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地方政府对审计机关不良干预、国家审计追责整改能力有待加强、审计重点与时事政策的结合存在时差等问题,强化国家审计独立性、权威性和方向性,提高国家审计质量,进而提高国企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方面(ESG)的改善意识和企业行为。其次,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改变了国企面临的外部监督环境,引起媒体对企业更多关注,对国有企业产生更强的声誉压力和舆论监督,这不仅能够促进国企积极响应党委审计委员会对 ESG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号召,还可以抑制国企损害 ESG 的行为,进而提高自身 ESG 表现。最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向国企释放重视 ESG 表现的信号,促使企业调整高管招聘方向,优化高管团队 ESG 倾向,进而改善国有企业 ESG 表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组建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 ESG 表现。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 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是通过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和媒体关注度、调整企业高管招聘方向来提高国企 ESG 表现的;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企 ESG 表现的提升效果在党组织嵌入程度更高、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频次更高、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更完善以及直接受中央管理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企 ESG 表现的改善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价值。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本文拓展了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这一重要审计管理体制变革措施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研究。现有研究发现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韧性^[9-11],而相比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 ESG 表现聚焦于非财务领域、具有更标准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本文以国企 ESG 表现为落脚点,实证检验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微观经济后果,丰富了党领导国家审计工作的微观治理效应,为进一步推动审计管理体制变革提供实证参考和理论指引。第二,本文从国家政策层面丰富了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文献多从治理结构、经营环境等方面研究宏观政策对企业 ESG 表现的治理效果^[7-8],探究党政方针对企业 ESG 表现的研究较少。而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ESG)的高质量发展仅靠其自身驱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党和国家发挥政策指引、标准制定等作用^[4]。柳学信等发现党组织嵌入能够改善企业 ESG 表现^[12],但这是在宏观指引下企业内部党组织治理对 ESG 的影响,并非外部党组织政策对 ESG 的治理作用。本文以组建中央和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这一外部多期事件为出发点,探究国家审计管理体制变革如何影响国企 ESG 表现,能够进一步丰富企业 ESG 表现影响因素在党政决策部署层面的研究,为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参考思路。

二、文献综述

关于党委审计委员会的相关研究,学者主要对党委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作用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讨论与评价。学者普遍认为,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在于“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抓大事”,即对国家审计进行更侧重宏观政策、方向指引的战略性领导,而非实操性的具体指导^[1,13]。作为政治机关,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发挥党领导审计工作的作用,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完善落实问题整改机制^[15],提高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推动形成全国审计“一盘棋”的发展格局^[1]。关于党委审计委员会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有研究者指出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后,审计机关职能权限扩大,现行审计制度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与其顺利高效衔接^[16]。也有研究者针对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和地方审计机关报告关系不明确的问题,提出将审计机关独立出来,由人大产生并在党委审计委员会和上级审计机关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13]。还有文献通过实证检验,提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提高国家审计的预算执行和监督能力,从而减少支出预算偏离^[11],还可以发挥治理效应、威慑效应和学习效应,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10],同时通过降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和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国有企业韧性^[9]。

关于企业 ESG 表现影响因素的文献研究主要分为公司治理、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三个层面。在公司治理方面,良好的内部控制^[17]、共同机构投资者^[18]等能够显著提高企业 ESG 表现。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等机制,对企业 ESG 表现产生提升作用^[19],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 ESG 存在“倒 U 形”关系^[20]。在外部环境方面,学者研究发现媒体报道^[5]和投资者关注^[6]等可以强化企业外部

监督,提高信息透明度,改善企业 ESG 表现;地区空气污染情况督促企业进行战略调整,增加绿色投资,是影响企业 ESG 表现的重要因素^[21]。在国家政策方面,绿色税制改革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入并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高重污染企业 ESG 表现^[7]。此外,其他政策例如柔性税收征管^[8]等也会正向影响企业 ESG 表现。

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关于党委审计委员会的研究多聚焦政策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不够充分,关于企业 ESG 行为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层面,尚未有研究考察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这一审计管理体制变革措施对国有企业 ESG 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企 ESG 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家审计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经济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现有审计体系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制约了审计监督效能的提升^[1]。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审计独立性受损。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地方政府能够影响审计机关的人事任免、经费保障等^[22],可能会不当干预审计机关工作,致使审计妥协现象普遍存在^[23]。第二个问题是国家审计权威性不足。国家审计只有建议权,基本没有行政处罚权^[24],但企业更关注查出问题的定性定责而非后续整改^[1],由于国家审计难以有效追责,“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现象频发。第三个问题是国家审计方向性有待加强。审计系统中存在审计方向偏离经济发展需要、缺乏向本级党委汇报的明确制度安排等问题^[1],使审计机关难以及时把握国家审计重点及其转变,致使企业趋于迎合偏离的审计要求。针对以上问题,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充分发挥其统筹领导、协调决策和审计监督职能,切实提高国家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方向性。首先,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加强了党对国家审计的领导,强调审计作为国家监督手段的政治性和独立性,重塑了地方政府与审计机关之间的关系,削弱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25]。其次,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赋予国家审计最高政治属性,提高审计机关的政治权威、制度权威和工作权威^[1,26],且党委审计委员会负责召集开展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加强国家审计与纪检监察等机关贯通协同,进一步强化审计机关追责能力,压实整改责任,督促国有企业提高对审计查出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落实力度^[10]。最后,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强调“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13],要求国家审计必须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因此,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有助于国家审计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要求和谋划,通过及时调整审计内容、审计范围等,推动国家审计进一步突破传统财务收支局限,拓展至生态保护、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等领域^[25],确保“五位一体”、双碳目标等党的重大决策在企业层面及时落地^[16]。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强化审计机关的独立性、权威性和方向性,从而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如图 1 中路径 1 所示。国家审计质量的提升能够分别改善国有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方面的表现。具体地,在环境方面,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后,国企能够察觉到国家审计对环境保护的重视^[1,28],为避免审计处罚,赢得良好审计结果公示所带来的声誉效应,国企更倾向于积极主动调整决策方向,将资源向绿色发展、环保治污方向倾斜,并规范排污操作,合规使用环保专项资金,提高企业环保资源配置。在社会责任方面,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促使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愈发关注,威慑、引导国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推动企业坚守合规经营底线,提高国有企业在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中的参与度。党委审计委员会通过将社会责任要求嵌入审计全流程,促使国企逐渐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承担,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公司治理方面,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提高国家审计结果作为国有企业管理层履职和晋升考核依据的激励效应,对管理层的利润操纵等短视行为产生强大的事前威慑作用^[10],同时其定期信息公开和与纪检财政部门联合办公促使管理层重视整改国家审计揭示的治理问题,及时修补漏洞,从而促进国企治理水平提升^[29]。

除了提高国家审计质量,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还可以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改善国企 ESG 表现。媒体关注一般是指新闻媒体对所在地区和关注领域企业相关信息的报道,本质上是对风险和变化信号的敏感捕捉。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意味着党政联合、审计纪检协同^[30],国有企业潜在的违规风险和经营隐患暴露风险大大提高,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成为媒体关注和报道热点。此外,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主动、定期发布审计报告、整改要求和问责情况等,为媒体提供权威信息源,进一步促使媒体关注涉事公司和其他企业的相关表现。而媒体关注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会影响公司的管理决策和经济表现^[31],包括 ESG 表现^[5]。媒体关注对国企 ESG 表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在组建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的背景下,媒体对企业的

关注焦点会随着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发生转移,更加关注国有企业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契合性,即 ESG 表现,媒体相关报道会影响政府、投资者和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国企发展潜力和经营状况的判断,进而给国有企业带来声誉压力。为了赢得良好声誉或缓解负面媒体报道带来的声誉损失,国企会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加大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承担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投入,以便搭乘媒体关注的“顺风车”,向现有和潜在的投资方传递积极信号,塑造良好 ESG 表现与发展潜力的公司形象。第二,企业可能过度追求短期效益而不重视长期可持续发展^[12],媒体关注所具有的舆论监督功能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媒体对国有企业环境破坏、逃避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漏洞等行为的报道,极大降低了国企和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引发外界对国企负面行为的不满和抵制,此外,媒体报道会通过网络媒介迅速传播甚至引发司法介入,这些均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短视行为的曝光风险和处理成本。因此,密切的媒体关注能够强化国企外部监督,对国企不利于 ESG 发展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减少国有企业做出降低 ESG 表现的经营选择和管理决策。综上,如图 1 中路径 2 所示,媒体关注作为国企内外的信息桥梁,可以利用声誉压力促使国有企业迎合 ESG 相关政策要求、通过舆论监督抑制国有企业 ESG 缺陷行为,从而提高国企 ESG 表现。

组建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还能够促使国有企业调整高管招聘方向,进而改善 ESG 表现。党委审计委员会需要审计审议监督重大政策落实情况,随着国家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企业 ESG 表现成为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向。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向国有企业释放战略导向信号,促使国企将 ESG 表现纳入核心治理目标,这会直接作用于国企高管团队的招聘环节。在对外招聘或开展内部提拔时,国有企业会推动更多具备 ESG 意识的管理层进入高管团队,促使 ESG 理念成为团队共识。由于管理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倾向比较抽象且难以量化,相关研究可以借助相关人口统计指标进行间接筛选^[32]。根据烙印理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环境影响会内化为对应烙印,改变其价值取向并产生长期影响,因此高管背景特征会影响其 ESG 倾向。当企业聘用更多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时,国企高管团队会敏锐感知到环境压力对企业的影响^[33],并对保护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迫切性有充分认知^[35],能够提升高管团队的环境注意力和社会责任意识。此外,当聘用更多具有海外背景高管时,一方面,海外背景高管更认同社会责任理念和思维,了解海外社会责任履行实践经验^[32],能够提高管理团队的社会责任意识;另一方面,海外背景高管可以将外企先进管理经验引入本国企业,提高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增强国企风险承担水平^[35],优化公司治理。因此,国有企业聘用更多环保背景和海外背景高管时,高管团队具有更强的 ESG 倾向,如图 1 中路径 3 所示。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塑造其价值观念,并最终体现于企业经营决策中。依据高层梯队理论,当高管团队具有强 ESG 倾向时,会通过推动国有企业 ESG 体系建设、资源倾斜等途径提高国企 ESG 表现。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

H: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 ESG 表现。



图 1 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提高国有企业 ESG 表现理论框架

由于管理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倾向比较抽象且难以量化,相关研究可以借助相关人口统计指标进行间接筛选^[32]。根据烙印理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环境影响会内化为对应烙印,改变其价值取向并产生长期影响,因此高管背景特征会影响其 ESG 倾向。当企业聘用更多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时,国企高管团队会敏锐感知到环境压力对企业的影响^[33],并对保护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迫切性有充分认知^[35],能够提升高管团队的环境注意力和社会责任意识。此外,当聘用更多具有海外背景高管时,一方面,海外背景高管更认同社会责任理念和思维,了解海外社会责任履行实践经验^[32],能够提高管理团队的社会责任意识;另一方面,海外背景高管可以将外企先进管理经验引入本国企业,提高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增强国企风险承担水平^[35],优化公司治理。因此,国有企业聘用更多环保背景和海外背景高管时,高管团队具有更强的 ESG 倾向,如图 1 中路径 3 所示。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塑造其价值观念,并最终体现于企业经营决策中。依据高层梯队理论,当高管团队具有强 ESG 倾向时,会通过推动国有企业 ESG 体系建设、资源倾斜等途径提高国企 ESG 表现。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

H: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 ESG 表现。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是新时代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的重要举措,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审计制度,这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指明了方向,是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和新起点。2018 年 5 月,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审计委员会相继组建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至 2019 年 4 月河南省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全国省级党委审计委员会均全部成立。据此,本文

选取 2014—2023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以下要求对数据进行处理:(1)剔除金融、房地产行业样本,因为这两个行业数据特殊,不具备可比性;(2)剔除 ST、*ST 企业样本;(3)剔除资不抵债样本;(4)剔除主要变量缺失样本,最终本文得到 31238 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为减少样本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其中,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间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审计厅(局)官网、信息公开平台以及官方电话询问等方式手工收集整理,并与郭檬楠等^[9]研究数据核对一致;国家审计质量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审计年鉴》;省级宏观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央及地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数据根据官网披露手工整理获得;本文其他数据来自 CNRDS 数据库、WIND 数据库和 CSMAR 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 ESG 表现(*ESG*)。参考方先明和胡丁^[36]的定义方式,本文使用华证 ESG 评级体系衡量企业 ESG 表现。华证 ESG 评级衡量企业 26 个相关指标,并采用行业加权平均法计算指标,将企业 ESG 表现分为 9 级,从高到低依次是 AAA、AA、A、BBB、BB、B、CCC、CC、C。为方便量化计算,本文将九档评级从高到低分别赋值 9—1,例如评级为 AAA 时赋值为 9,评级为 AA 时赋值为 8,用 *ESG* 表示。

2. 解释变量: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PCAudit*)。参考已有文献^[10],本文构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分组虚拟变量和分期虚拟变量:当企业为国有企业时,分组虚拟变量 *SOE* 赋值为 1,否则为 0;当该年为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第一次召开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的当年及以后年份时,分期虚拟变量 *Post* 赋值为 1,其中,直接受中央管理的企业以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本文将分组虚拟变量和分期虚拟变量做交乘生成变量 *PCAudit*,用以衡量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政策效应。

3. 控制变量。本文借鉴相关研究^[10-11],进一步控制了如下公司和省份层面的其他变量:公司规模(*Size*)以上市公司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资产负债率(*Lev*)以年末总负债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度量;总资产净利润率(*ROA*)以净利润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值度量;现金流比率(*Cashflow*)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度量;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以本年营业收入与上一年营业收入的比值减 1 度量;管理费用率(*Mfee*)以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度量;劳动密集度(*Cap*)以资产总计与员工人数的比值度量;高管薪酬激励(*Pay*)以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度量;董事会规模(*Board*)以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度量;两权分离率(*Seperate*)以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与所有权比例之差度量;分析师跟踪(*Analyst*)以分析师跟踪人数加 1 的自然对数度量;经济发展水平(*GDP*)以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的当年国内生产总值除以 10000 度量。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公司个体固定效应和年度时间固定效应。

(三)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检验上述假设是否成立,本文构建以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1):

$$ESG = a_0 + a_1PCAudit + \sum a_kControls + Symbol + Year + \varepsilon \tag{1}$$

其中,*ESG* 表示企业 ESG 表现,*PCAudit* 表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系数 a_1 表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若 a_1 显著为正,则假设 H 被验证;*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组;*Symbol* 表示公司个体固定效应;*Year* 表示年度固定效应; 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企业 ESG 表现(*ESG*)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8,均值为 4.1572,说明企业 ESG 表现存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ESG</i>	31238	4.1572	1.0125	1	4	8
<i>PCAudit</i>	31238	0.2011	0.4008	0	0	1
<i>Size</i>	31238	22.2263	1.2652	19.9872	22.0335	26.1859
<i>Lev</i>	31238	0.4023	0.1977	0.0552	0.3916	0.8837
<i>ROA</i>	31238	0.0366	0.0636	-0.2434	0.0380	0.2011
<i>Cashflow</i>	31238	0.0507	0.0661	-0.1414	0.0491	0.2436
<i>Growth</i>	31238	0.1452	0.3612	-0.5225	0.0904	2.1074
<i>Mfee</i>	31238	0.0833	0.0649	0.0077	0.0668	0.3890
<i>Cap</i>	31238	14.5793	0.7931	12.7937	14.5212	16.8901
<i>Pay</i>	31238	15.4558	0.6814	13.8276	15.4344	17.316
<i>Board</i>	31238	2.1023	0.1958	1.6094	2.1972	2.6391
<i>Seperate</i>	31238	0.0450	0.0704	0	0.0004	0.2774
<i>Analyst</i>	31238	1.2752	1.1790	0	1.0986	3.7842
<i>GDP</i>	31238	5.9716	3.5715	0.4090	4.8502	13.5673

在较大差异,与现有研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相似^[36];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政策(*PCAudit*)均值为 0.2011,表示受到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影响的观测样本占总样本的 20.11%。其他控制变量与现有研究的统计量相似且均处于合理区间^[10,12],此处不再赘述。

(二) 回归分析

表 2 为基于模型(1)检验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与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基础回归结果。第(1)列仅控制个体和年度固定效应,第(2)列进一步控制其他控制变量。可以看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与国企 ESG 表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实证结果有效支持本文假设,即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提高国有企业 ESG 表现。

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否对国有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产生促进作用,以华证 ESG 评级在 E、S、G 三个方面的分别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赋值方式同 *ESG*,带入模型(1)考察验证。回归结果如表 2 第(3)列至第(5)列所示,相关系数至少在 10% 水平显著为正,表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分别显著改善国有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方面的表现。

表 2 回归分析

	(1) <i>ESG</i>	(2) <i>ESG</i>	(3) <i>E</i>	(4) <i>S</i>	(5) <i>G</i>
<i>PCAudit</i>	0.0986 *** (3.4513)	0.0972 *** (3.4927)	0.0543 * (1.8415)	0.1659 *** (3.9506)	0.0722 * (1.8573)
<i>Constant</i>	4.1374 *** (720.4311)	0.9849 * (1.8071)	-1.0361 (-1.6451)	1.5885 * (1.8483)	2.0451 *** (2.8496)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和公司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1238	31238	31238	31238	31238
R ²	0.5167	0.5318	0.5070	0.5396	0.52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经异方差调整、个体层面聚类处理后计算得到的 *t* 值;***、** 和 * 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六、稳健性检验

(一)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参考 Baker 等^[37]的研究,采用时间窗口(-3,3)内年份虚拟变量(共 7 个),*Pre3*、*Pre2*、*Pre1*、*Current*、*Post1*、*Post2*、*Post3* 分别表示企业所属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 3 年、前 2 年、前 1 年、会议当年、未来 1 年、未来 2 年、未来 3 年及以后年度,并分别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本文将以上年份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以企业所属的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的第 4 年及以前年度为基期,带入模型(1)检验企业 ESG 表现的时间趋势。图 2 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之前的年份虚拟变量交乘项不显著异于 0,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当年及之后年份虚拟变量交乘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异于 0,说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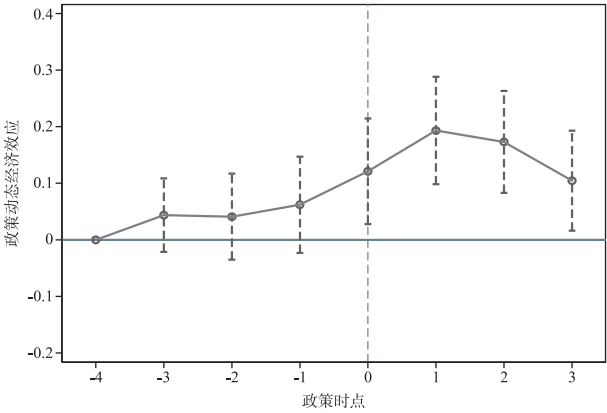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可以看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之前的年份虚拟变量交乘项不显著异于 0,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当年及之后年份虚拟变量交乘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异于 0,说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二) 安慰剂检验

在上文检验中,基准回归控制了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以外多项特征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但企业 - 年份层面不可观测因素仍有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为了排除其他未知政策的影响,本文参考 Li 等^[38]的做法,通过随机分配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企业和组建年份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实际回归系数显著高于安慰剂检验的 0 均值,证明本文估计结论通过安慰剂检验,结果未列示,留存备案。

(三) PSM-DID 检验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尽可能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在平衡性检验通过的基础上,结果(留存备案)显示,*PCAudit* 的估计系数在 10% 水平依然显著为正,证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改善作用确实存在。

(四) 更改企业 ESG 表现的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三种方式对企业 ESG 表现的衡量方式进行替换^[38-40]:(1)依据华证 ESG 评级大类重新赋值,其中 CCC、CC、C 赋值为 1, BBB、BB、B 赋值为 2, AAA、AA、A 赋值为 1; (2)将万得 ESG 评级 C—AAA 分别赋值为 1—9;

(3) 参考 ESG 评级分歧的数据计算方式,将华证、万得、彭博、罗素和润灵 5 个 ESG 评价机构的评级结果进行赋值并加以均值计算,对数化处理后作为综合评级测度指标。结果(留存备案)显示,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后政策效应(*PCAudit*)估计系数至少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五) 排除其他地区及政策因素的影响

为排除地区因素对本文结果的干扰,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企业所在省份固定效应、省份和年份交乘固定效应进一步回归。结果(留存备案)显示,在排除地区其他事项影响后,政策效应(*PCAudit*)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根据郭耀楠等^[10]的分析,2015 年的审计机关人财物改革、2018 年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颁布可能会影响本文的结论。为了排除以上两个政策对本文结论的影响,本文一是剔除注册地在 7 个人财物改革试点省市的样本数据,二是剔除中央企业样本,分别重新回归。结果(留存备案)显示,*PCAudit* 的估计系数均在 10% 水平上保持显著为正,本文结论不变。

七、进一步分析

(一) 机制检验

1. 国家审计质量。根据前文分析,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提高国家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以及与国家政策的契合性,强化监督强度,提高国家审计质量,进而改善国有企业 ESG 表现。本文参考现有文献对国家审计质量的定义方式^[10],采用国家审计中各省份被采纳建议条数与审计提出条数的比值衡量国家审计质量,该值越高,表明国家审计质量越高。

中介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3 第(1)列所示。由回归结果可知,*PCAudit* 估计系数为 0.0061,在 1% 水平显著为正,说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通过提高国家审计质量,进而提高国有企业 ESG 表现。

2. 媒体关注度。根据前文分析,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提高媒体关注度,通过声誉压力与舆论监督来提高国有企业 ESG 表现。因此,本文参考李文贵和路军^[41]的做法,使用公司的财经报刊新闻报道总数加 1 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的媒体关注度,该值越高,说明企业受到的媒体关注越多。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3 第(2)列所示。由实证结果可知,政策效应(*PCAudit*)的估计系数为 0.1041,在 1% 水平上显著,证明提高媒体关注度能够作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改善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机制。

3. 高管招聘方向。根据前文分析,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促使国企聘用更多具有环保背景和海外背景的高管来优化高管团队,进而提高国有企业 ESG 表现。因此,本文通过检索高管个人简历中的环保关键词来判断高管是否具有环保背景,并以企业当年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数量对数值来测度企业高管团队环保背景情况,构建虚拟变量 *ME_nB* 衡量企业当年是否聘用更多环保背景高管:若当年企业具有环保背景的高管数量对数值大于上一年,则 *ME_nB* 赋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参考文雯和宋建波的做法^[32],以企业当年具有海外背景高管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重测度企业高管团队海外背景情况,构建虚拟变量 *MO_vB* 衡量企业当年是否聘用更多海外背景高管:若当年企业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占比大于上一年,则 *MO_vB* 赋值为 1,否则为 0。此外,本文还构建虚拟变量 *MESG* 来衡量高管团队 ESG 倾向,当 *ME_nB* 和 *MO_vB* 至少一个取值为 1 时,*MESG* 赋值为 1,否则为 0。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3 第(3)列至第(5)列所示。由实证结果可知,政策效应(*PCAudit*)的估计系数至少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通过促进国有企业调整高管招聘方向,优化高管团队 ESG 倾向,进而提升国有企业 ESG 表现。

(二) 异质性检验

1. 党组织嵌入程度。由前文可知,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通过帮助国企及时把握党和国家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愈发重视的政策倾向,从而促进国企主动改善 ESG 表现。按照这一逻辑,当国有企业党组织结构嵌入程度更高、距离决策中心更近时,国企内党组织通过党员学习大会、与党委审计委员会开会交流等形式,能够更

表 3 机制检验

	(1) 国家审计 质量	(2) 媒体 关注度	(3) 聘用更多环保 背景高管	(4) 聘用更多海外 背景高管	(5) 聘用更多 ESG 倾向高管
<i>PCAudit</i>	0.0061 *** (2.8517)	0.1041 *** (4.0905)	0.0154 ** (2.4830)	0.0195 ** (2.5312)	0.0295 *** (2.9584)
<i>Constant</i>	0.8582 *** (19.7722)	-0.3227 (-0.6078)	0.0510 (0.4118)	0.2080 (1.3804)	0.2920 (1.54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和公司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6684	29752	31238	23591	24000
R ²	0.7040	0.9180	0.1899	0.1821	0.2922

早察觉党委审计委员会关于提高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指导要求,更有能力影响国企的经济决策,从而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提高作用更强。此外,更高的党组织嵌入程度有利于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号召和要求在国企中得到高度重视和高效率执行,进而更充分发挥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按照以下分组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1)本文借鉴赵云辉等^[42]的衡量方式,使用高管层党员人数占高管人数的比例作为国企党组织结构嵌入程度的测度指标,根据国有企业党组织结构嵌入程度是否不低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前一年的年度中位数,分为党组织结构嵌入程度高和低两个子样本。(2)参考已有做法^[43],本文以国有企业当年 CEO 是否为党员将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测度国企党组织距离

表 4 异质性:党组织嵌入程度和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频次

	(1)	(2)	(3)	(4)	(5)	(6)
	党组织结构 嵌入程度高 ESG	党组织结构 嵌入程度低 ESG	党组织距离 决策中心近 ESG	党组织距离 决策中心远 ESG	公司审计委员会 会议频次高 ESG	公司审计委员会 会议频次低 ESG
PCAudit	0.1101 *** (3.0990)	-0.0205 (-0.3304)	0.1226 *** (2.6570)	0.0478 (1.0906)	0.1150 *** (3.8699)	0.0910 (1.0296)
Constant	1.0674 (1.3531)	0.9999 (1.1963)	0.8398 (0.8880)	0.7685 (1.1226)	0.9331 (1.5519)	0.9579 (0.66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和公司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3441	12057	10643	20593	23617	7621
R ²	0.5315	0.5022	0.6287	0.5598	0.5787	0.7106

决策中心远近。相比 CEO 非党员的企业,CEO 是党员的企业党组织嵌入程度更高,在察觉到政策方向转变时能够更及时地做出提高企业 ESG 方面表现的决策并予以执行。表 4 第(1)列至第(4)列报告了上述子样本的分组回归结果。根据表 4 第(1)列、第(3)列,当党组织嵌入程度高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PCAudit)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显著为正;根据表 4 第(2)列、第(4)列,当党组织嵌入程度低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PCAudit)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当党组织嵌入程度更高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2. 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频次。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的组建加强了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提示国企除了重视外部国家审计结果和整改过程,还要加强国有企业内部党建对审计工作的指导作用。2020 年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指出,企业要建立健全党委(党组)直接领导下的内部审计领导体制,内部审计机构需要向本级党委(党组)报告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国企内部审计力度可能会影响党委审计委员会在企业层面作用的发挥。其中,公司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领导,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党委审计委员会在企业内外相呼应,可能存在协同治理效应^[10]。因此,本文预期,当公司审计委员会更尽职活跃时,即审计委员会会议更频繁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根据企业当年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是否不低于样本年度中位数,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审计委员会会议频次高、审计委员会会议频次低两组,并进行异质性分析。表 4 第(5)列至第(6)列报告了上述子样本的分组回归结果。根据表 4 第(5)列,当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频次更高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PCAudit)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根据表 4 第(6)列,当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频次更低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PCAudit)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当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频次更高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3. 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完善程度。党委审计委员会的组建并不意味着国家审计治理功能充分发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13],逐步解决党委审计委员会功能定位、报告关系、跨部门合作等问题,从而更好发挥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的优越性,将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政治权威性转化为改善国有企业 ESG 表现、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动能。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政效率存在差异,各地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制度完善程度并不相同,更高完整性、规范性和协同性的运行制度能够为地区党委审计委员会规定明确的责任边界,打破部门壁垒,为其提高审计监督效果、促进国家治理升级提供制度保障^[26]。本文预期,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越完善,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改善效果越明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按照以下分组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1)党委审计委员会越早成立运行,其参与经济监督就越充分^[11];同时,探索调整工作制度的时间越长,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完善程度越高。本文计算各地区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间距离中央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差,参考 Cunningham 等^[44]的做法,根据该时间差是否高于中位数,构建分组虚拟变量 SOE_Highmeeting(国企所属地区会

议召开时间差高于中位数,即更早召开第一次党委审计委员会,赋值为 1,否则为 0)和 *SOE_Lowmeeting* (国企所属地区会议召开时间差不高于中位数,赋值为 1,否则为 0),将这两个分组虚拟变量与前文构建的分期虚拟变量分别做交乘,生成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更完善时的政策效应变量(*PCAudit_Highmeeting*)和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不完善时的政策效应变量(*PCAudit_Lowmeeting*)。(2)党委审计委员会通常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进行工作部署和讨论,地方政府对党委审计委员会工作会议的报道宣传更频繁,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党委审计委员会通过高频次会议快速补位,履行党委审计委员会职责的效率更高,从而促进相关制度完善性提高。本文收集官方网站对各地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新闻报道,计算样本区间 2014—2023 年各地区总报道次数^①,依据在国有企业中报道次数是否高于中位数,构建分组虚拟变量 *SOE_Highreport* (国企所属地区总报道次数高于中位数赋值为 1,否则为 0)和 *SOE_Lowreport* (国企所属地区总报道次数不高于中位数赋值为 1,否则为 0),将这两个分组虚拟变量与前文构建的分期虚拟变量分别做交乘,生成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更完善时的政策效应变量(*PCAudit_Highreport*)和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不完善时的政策效应变量(*PCAudit_Lowreport*)。回归结果如表 5 第(1)列和第(2)列所示。根据回归结果,当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完善程度更高时(*PCAudit_Highmeeting*和*PCAudit_Highreport*),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与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当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完善程度更低时(*PCAudit_Lowmeeting*和*PCAudit_Lowreport*),回归系数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当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完善程度更高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4. 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国有企业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相比地方国企,中央企业由中央直接管理或被委托中央部委管理,政府隶属程度更高,与党委审计委员会的距离更近,受到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影响也会更强、更直接。除此之外,中央审计委员会最早成立且由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这代表其是地方各级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学习标杆和效仿对象,而中央企业受到中央审计委员会的直接影响,这使得央企先于地方国企受到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所带来的提升国家审计质量和媒体关注、调整高管招聘方向的影响,改善自身 ESG 表现的执行时间更长,从而产生更明显的提升效果。因此,本文预期,相比地方国企,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企 ESG 表现的提升效果在直接受到中央管理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参考 Cunningham 等^[44]的做法,根据国企是否为中央企业构建分组虚拟变量 *SOE_C* (企业为央企赋值为 1,否则为 0)、是否为地方国有企业构建分组虚拟变量 *SOE_L* (企业为地方国企赋值为 1,否则为 0),将这两个分组虚拟变量与前文构建的分期虚拟变量分别做交乘,生成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中央企业的政策效应变量(*PCAudit_CSOE*)和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地方国有企业的政策效应变量(*PCAudit_LSOE*)。为检测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不同影响,本文将 *PCAudit_CSOE* 和 *PCAudit_LSOE* 同时带入模型(1),替代原回归中的整体政策效应变量 *PCAudit*,其他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不变。表 5 第(3)列报告了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当企业为中央企业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PCAudit_CSOE*)的回归系数为 0.1822,在 1% 水平上显著;当企业为地方国有企业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PCAudit_LSOE*)的回归系数为 0.0550,在 10% 水平上显著。

表 5 异质性: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完善程度和中央或地方国有企业

	(1) 制度完善程度: 成立时间 ESG	(2) 制度完善程度: 报道频次 ESG	(3) 中央或地方 国有企业 ESG
<i>PCAudit_Highmeeting</i>	0.1435 *** (4.3899)		
<i>PCAudit_Lowmeeting</i>	0.0248 (0.6140)		
<i>PCAudit_Highreport</i>		0.1588 *** (4.8536)	
<i>PCAudit_Lowreport</i>		-0.0010 (-0.0242)	
<i>PCAudit_CSOE</i>			0.1822 *** (4.4531)
<i>PCAudit_LSOE</i>			0.0550 * (1.7612)
<i>Constant</i>	0.9868 * (1.8107)	0.9649 * (1.7690)	0.9796 * (1.79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和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1238	31238	31238
R ²	0.5320	0.5322	0.5320

①本文手工收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审计厅(局)官网自成立起至 2023 年对本地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新闻报道,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的文章报道加以补充,其中,中央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新闻报道源自审计署网站。由于多数地区在一年中仅有 1 次报道,因此本文计算整个样本区间的会议报道次数作为测度标准。需要注意的是,存在部分地区可能在某些年份召开审计委员会会议但并未报道或者报道被删除的情况,因此该数据存在一定缺陷,无法确切等于地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开会频次,仅用于衡量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完善程度。

LSOE)的回归系数为0.0550,仅在10%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的ESG表现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是在中央企业中效果更大且更显著。以上结果说明,当企业直接受中央管理时,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三)经济后果检验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显著提高国有企业ESG表现。随着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受到利益相关者广泛关注,为企业在融资、声誉等方面带来收益,改善企业财务绩效^[45],最终提高企业价值。王琳璘等利用2009—2020共48个季度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企业资金成本、提高资金可得性、提升企业效率等^[3]。王波和杨茂佳认为,除了缓解融资压力外,企业出色地履行ESG责任可以为其带来更多市场关注,向市场传递企业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积极信号,从而提高企业价值^[46]。由此,本文预期,组建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通过改善国有企业ESG表现来提高企业价值,实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目标。为了验证这一经济后果,本文借鉴已有研究^[47],以托宾Q值(Tobin Q)测度国有企业价值,该指标的值越大表明企业价值越高。

表6汇报了以企业价值(Tobin Q)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经济后果检验。在表6第(1)列中,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PCAudit)与企业价值的回归系数为0.3082,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提高国有企业价值。表6第(2)列中,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与国企ESG表现的交乘项(PCAudit_ESG)的回归系数为0.0944,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结果意味着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通过改善国有企业ESG表现进而提升国企价值。这一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说明,组建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党和国家在审计监督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了督促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ESG)等方面高质量发展、进而提高国有企业价值的目标。

表6 经济后果检验

	(1) Tobin Q	(2) Tobin Q
PCAudit	0.3082 *** (7.3786)	-0.0856 (-0.9617)
ESG		-0.0218 ** (-1.9727)
PCAudit_ESG		0.0944 *** (4.9845)
Constant	27.4064 *** (25.1600)	27.5033 *** (25.17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和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31238	31238
R ²	0.7562	0.7565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版引入ESG理念,这些无不说明宏观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更高要求。本文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利用组建中央及地方党委审计委员会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ESG表现,该实证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企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方面的表现均有显著改善效果。机制分析发现,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主要通过三条路径提升国有企业ESG表现,分别是提高国家审计质量、提高媒体关注度和调整国企高管招聘方向。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党组织嵌入程度更高、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频次更高、党委审计委员会制度更完善以及直接受中央管理的企业中,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效果更明显。经济后果分析发现,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通过提高国企ESG表现进而显著提高国有企业价值,以实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扩大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家审计质量的提高效果,通过制定准确的职责定位、详细的工作章程等,明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审计委员会的权限与报告关系,构建相关法律体系,最大程度发挥党委审计委员会促进国有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治理效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地方审计机关应加强与党委审计委员会的联系,及时向党委审计委员会汇报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时宜、阻碍发展的制度问题,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宏观决策提供更多思路和参考。同时,地方审计机关应与党委审计委员会共同推动宣传舆情建设,巧用媒体力量促进国有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国有企业应重视企业党组织建设,提高管理层党员干部比例,进一步提

高企业决策层对党和国家政策变化的关注度和敏感性,保持与大局发展步调统一。此外,国企在聘用高管时,应考虑将环保、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背景或倾向从“可选性能力”升级为“核心胜任力”,增强高管团队 ESG 意识,进而改善企业 ESG 表现。

本文虽围绕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国企 ESG 表现的影响展开系统研究,但仍存在一定局限。其一,样本聚焦上市企业,未涵盖非上市国企,而非上市国企中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对 ESG 表现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别于上市公司的传导路径,这一差异化路径有待进一步验证与探索。其二,受限于数据可获得性,对核心解释变量——“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异质性检验不够深入,未充分考虑党委审计委员会异质性带来的细微差异,如党委审计委员会成员专业背景、履职时长、项目参与程度等特征的影响尚未深入剖析。其三,对 ESG 表现的评级维度选取不够丰富,当前研究更多基于现有评分体系开展分析,侧重于量化评分角度,未能充分兼顾 ESG 表现的多元特征,未来可探索从更新型、更全面的 ESG 表现维度进行评估与研究。未来研究可拓展样本范围,纳入非上市国企数据;细化变量衡量维度,深入分析党委审计委员会微观特征的异质作用;拓展 ESG 评级的衡量维度,探索多维度、全面化的评估方式。同时,可结合审计管理体制变革等政策背景,考察外部制度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

参考文献:

- [1] 彭华彰. 新时代审计整改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研究[J]. 审计研究, 2024(2): 9-16.
- [2] 秦荣生. 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内部审计制度完善和发展[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5(2): 1-8.
- [3] 王琳璘, 廉永辉, 董捷. ESG 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 2022(5): 23-34.
- [4] 夏芸, 张茂, 林子昂. 政府补助能否促进企业的 ESG 表现?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J]. 管理现代化, 2023(1): 54-63.
- [5] 翟胜宝, 程妍婷, 许浩然, 等. 媒体关注与企业 ESG 信息披露质量[J]. 会计研究, 2022(8): 59-71.
- [6] 陈晓珊, 刘洪铎. 投资者关注影响上市公司 ESG 表现吗——来自网络搜索量的经验证据[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3(2): 15-27.
- [7] 王禹, 王浩宇, 薛爽. 税制绿色化与企业 ESG 表现——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研究, 2022(9): 47-62.
- [8] 许英杰, 许宪春, 田芳菲. 柔性税收征管与企业 ESG 表现[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 54-64.
- [9] 郭檬楠, 宋鑫伟, 李娜. 审计管理体制变革与国有企业韧性——基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准自然实验[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4(5): 1-9.
- [10] 郭檬楠, 李娜, 吴秋生. 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内外部监督主体的协同治理作用[J]. 会计研究, 2024(1): 179-192.
- [11] 王兵, 吕梦. 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运行与预算执行偏离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4(6): 1-11.
- [12] 柳学信, 李胡扬, 孔晓旭. 党组织治理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J]. 财经论丛, 2022(1): 100-112.
- [13] 李明辉. 审计委员会背景下我国国家审计体制改革思路探讨[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4(1): 148-160.
- [14] 王彪华, 谢莹莹.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生态分析: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J]. 会计研究, 2020(1): 169-178.
- [15] 李磊, 杨道广. 国家审计高质量发展: 内涵、现状与路径[J]. 审计研究, 2021(5): 9-15.
- [16] 王彪华. 新形势下国家审计职能定位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0(11): 162-171.
- [17] 陈晓珊, 刘洪铎. 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 ESG 表现[J]. 统计与决策, 2025(9): 169-173.
- [18] 何青, 庄朋涛. 共同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 ESG 表现? [J]. 证券市场导报, 2023(3): 3-12.
- [19] 胡洁, 韩一鸣, 钟咏.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 ESG 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产业经济评论, 2023(1): 105-123.
- [20] 王应欢, 郭永祯.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 ESG 表现——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财经研究, 2023(9): 94-108.
- [21] 潘玉坤, 郭萌萌. 空气污染压力下的企业 ESG 表现[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7): 112-132.
- [22] 吴联生. 政府审计机构隶属关系评价模型——兼论我国政府审计机构隶属关系的改革[J]. 审计研究, 2002(5): 14-18.
- [23] 郑石桥, 尹平. 审计机关地位、审计妥协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J]. 审计研究, 2010(6): 53-58.
- [24] 彭华彰, 刘晓靖, 黄波. 国家审计推进腐败治理的路径研究[J]. 审计研究, 2013(4): 63-68.
- [25] 叶陈刚, 黄冠华, 朱郭一鸣. 审计管理体制变革与地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试点改革的自然实验[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1(3): 1-11.
- [26] 雷俊生. 嵌入式治理视角下的监督资源整合——基于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协同机制构建[J]. 学术论坛, 2020(4): 69-75.
- [27] 刘悦晟, 吴汉利. 国家审计、数字技术与企业 ESG 表现[J]. 财会研究, 2025(2): 56-66.
- [28] 蔡春, 朱磊, 郑倩雯. 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提升审计质量了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0(6): 1-8.
- [29] 陈凤霞, 姜宾. 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 ESG 表现[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4(3): 24-33.
- [30] 沈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审计整改制度: 回顾与思考[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4): 1-8.
- [31] 于忠泊, 田高良, 齐保奎, 等. 媒体关注的公司治理机制——基于盈余管理视角的考察[J]. 管理世界, 2011(9): 127-140.
- [32] 文雯, 宋建波.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J]. 管理科学, 2017(2): 119-131.
- [33] 曹洪军, 陈泽文. 内外环境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效应——高管环保意识的调节作用[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6): 95-103.

- [34]李毅,何冰洋,胡宗义,等. 环保背景高管、权力分布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J]. 中国管理科学,2023(9):13-21.
- [35]宋建波,文雯,王德宏.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财贸经济,2017(12):111-126.
- [36]方先明,胡丁. 企业 ESG 表现与创新——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23(2):91-106.
- [37]Baker A C, Larcker D F, Wang C C.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2, 144(2):370-395.
- [38]Li P, Lu Y, Wang J.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3(11):18-37.
- [39]齐鲁光,吴玉茹. 企业 ESG 表现改善了政企关系吗? ——基于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J]. 金融发展研究,2024(8):24-33.
- [40]冯钰婷,郭雪萌,曾晓亮. ESG 信息披露与 ESG 评级分歧:众口一词还是莫衷一是? ——兼论中国 ESG 的制度规范[J]. 会计研究,2024(1):49-63.
- [41]李文贵,路军. 网络平台互动与股价崩盘风险:“沟通易”还是“操纵易”[J]. 中国工业经济,2022(7):178-196.
- [42]赵云辉,杜若林,吴心月.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 A 股上市的民营企业数据[J]. 技术经济,2022(4):59-71.
- [43]庄明明,李善民,梁权熙.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吗? [J]. 管理评论,2022(11):246-260.
- [44]Cunningham L M, Johnson B A, Johnson E S, et al. The switch - up: An examination of changes in earnings management after receiving SEC comment letter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0, 37(2):917-944.
- [45]严伟祥,赵誉,孟德锋. ESG 评级对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影响研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3(6):71-80.
- [46]王波,杨茂佳. ESG 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我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软科学,2022(6):78-84.
- [47]郑国坚,林东杰,林斌. 大股东股权质押、占款与企业价值[J]. 管理科学学报,2014(9):72-87.

[责任编辑:刘 茜]

Establishment of Party Committee Audit Committe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SG Performance

LI Shihui, LIU Yancai, LI Mengzhe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measure in the reform of the audit management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 and local Party committee audit commission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strengthening state oversight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the high-quality ESG development of micro-level enterpri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study employ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using a sample of listed company data from 2014 to 2023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establishing Party committee audit commissions on the ESG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ompared to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y Committee Audit Committee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ESG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undergoing parallel trend tests, placebo tests, and other stability check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Party Committee Audit Committees improv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SG performance by enhancing state audit quality and media scrutiny, while adjusting executive recruitment strategies. Heterogeneity tests indicate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Party organisation embedding, more frequent company audit committee meetings, more robust Party Committee Audit Committee systems, and those directly manag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conomic consequence tests suggest that establishing Party Committee Audit Committees can enhance enterprise value by strengthening the ESG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Key Words: Party Committee audit committees; ESG; national audit; media attention; audit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audit quality; audit supervision system